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牵风记》人物评析

杜文静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1)

[摘要]2020年，八旬作家徐怀中的新作《牵风记》荣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小说主要讲述了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这一军事行动的伟大过程，它打破了传统军事题材小说的叙事模式，通过齐竞、汪可逾、曹水儿以及军马滩枣他们的传奇故事，展示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战地风景，为军事题材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别样的空间，在硝烟四起的战场上，对人的存在状态进行了理性思考。本文通过解读汪可逾这一人物形象，探究作家的现实人生诉求，有助于挖掘作品的丰富内涵。

[关键词]徐怀中；《牵风记》；汪可逾

【DOI】10.12252/j.issn.2096-6261.2021.03.300

《人世间》和《牵风记》分别名列状元、榜眼，值得注意的是，据笔者所知，近年来，战争或者军事题材的小说并不多。然而，《牵风记》是不同于中国当代战争小说的，它将战争厮杀血腥的场景抹去，突出的是在战争背景下个体现实的生存状态以及因为战争个体的未来状态，不再表现光辉的英雄形象，而是一个既有弱点又有优点的“普通人”，同时涉及周围的人，如此一来，读者的关注点便会有所偏移，他们类似于一群举着摄像机的摄影师，将聚光灯打在“汪可逾”的身上，她缓缓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中。因此，本文将从以下两个方面分析“汪可逾”这一人物形象，试图探究两个问题：一是“汪可逾”这一人物的特殊性是什么；二是“汪可逾”是否承载着九旬作家的及现实人生诉求。

汪可逾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受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双重熏陶，成为一位李清照式的人物，对未来充满憧憬，少女可爱之处跃然于纸上；另一面似乎又与妙玉的经历颇为相似，妙玉是一位官家小姐，带发修行。她不仅孤傲，而且似乎有洁癖。具有古典气息的汪可逾进入“夜老虎”侦察团之时，其种种行为显示她与周围人的不协调。汪可逾有几个毛病：讲卫生、强迫症、毫无心计，就如曹水儿认为的那样，她“是又一个尚未正式命名的自由天体。”是一个独立于地球之外的天体，若无陨石或者彗星之类天体的打扰，她会一直这样生存下去。妙玉未曾“还洁去”，结局凄凉令人唏嘘不已，汪可逾亦是如此，失手被俘，归队之后齐竞却怀疑她的贞洁，可是她却担心的不是齐竞是否相信自己，而是她不能像一个正常人参加工作，完成任务，然而二人不同之处在于，汪可逾的结局是崇高的。因此，汪可逾既是一位李清照式的有才情的古典女子，又是妙玉式的有着不堪回首却坦坦荡荡的孤傲女子，是妙玉，又不是妙玉，更是一颗自由运行的“不知所谓”的天体。

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殊不知，人也是自然中的一只精灵，那么汪可逾便是一只生于自然，死于自然的“白鹿精灵”。比如汪可逾出生时，父亲给女儿起名“纸团儿”，并无特殊含义，只是兴之所至，信手拈来，可见她的名字是自然所得，并非刻意所求。行军途中，狂风暴雨，战士们衣服以及背包皆被水浸湿，而汪可逾则在一家门洞里，放好木板，只穿一条短裤就睡着了。汪可逾的生命结束之时，剥离了外界的束缚，回归到生命最原始、最自然的存在状态，亦是九旬作家徐怀中“晚期风格”的作品所表现出的哲思境界。

不过笔者有一个疑惑：齐竞与汪可逾是否有爱情存在呢？笔者认为存在爱情，需要从他们的相识说起，初次见面，齐竞想到的是不应该让一位正值妙龄的女学生看到这样的场景，言下之意，他想将自己或者部下和群众最好的一面展示给这位女学生，而怀抱古琴，清新典雅的汪可逾吸引了他的注意。再看汪可逾对于齐竞的报告描写：“汪可逾坐在第一排，专心致志在听‘五号’的大报告，时不时在小本本上记下一些重点词句，显得特别专心致志。她痴痴地望着台上的报告人，毫不掩饰对这位年轻军事指挥家的仰慕之

情，这无异于情不自禁地做了自我暴露。”这可能人们通常所说的异性相吸，即是两个优秀之人互相吸，似乎有了一点郎才女貌的意味，颇具才子佳人小说的特点。

另一个判断依据，汪可逾遭受了齐竞的个人“审查”，他是在咄咄逼人，迫使汪可逾交代是否还是清白之躯，是一种男权道德伦理控制之下的思想。因此笔者认为，齐竞与汪可逾存在爱情，但作家徐怀中对于这样的战地爱情书写是有理性节制的，没有过多的情感流露，这也就是它区别于当代战争小说与一般言情小说中媚俗情节的原因之一。研究者在《论徐怀中〈牵风记〉的叙事艺术》一文中指出，“在《牵风记》中，爱情却带着悲凉的气息，主要体现在理想爱情的幻灭和独守婚姻的孤寂。”不过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汪可逾对于自己的遭遇似乎没有太多的情感发泄，可能性的解释就是她对这些外在束缚毫不在意，更何况作者有意识地将这一事情虚化，只是存在于齐竞与其他人的猜想之中。她不属于这个世界，只是如宝玉一般到这世间走一遭，所以，所谓的理想爱情终会破灭，体现出一种宿命论色彩的情感之悲。

综上所述，汪可逾这一人物形象被作家赋予了一种传奇色彩，既古典，又诗意；既自然，又不自然，这一人物的特殊性便在这里，统摄着整部小说的情感走向，却又“凌驾”于齐竞、曹水儿这些人物之上，没有打上性别符号的标签，只是在完成自己的“返程路线”。正是因为如此，汪可逾与九旬作家的文学创作以及现实人生诉求有何联系呢？刘大先指出，“《牵风记》很容易让人产生类似联想，确切地说，徐怀中发表这部作品时正好九十岁，这已经远超过庾信和王羲之的年纪，后二人的‘暮年’也就是五六十岁，放到现在也就是‘中年’。因而，《牵风记》可以说不折不扣地属于‘晚期风格’。刘大先又进一步对于“晚期风格”这一概念作了一定的解释“‘晚期风格’在文化史上并不鲜见，但作为文艺批评话语进行自觉的理论讨论主要得益于萨义德，陈晓明将其挪用至当代文学批评中并改造为‘晚期风格’，用以描述与生命的终结状态相关的那种容纳矛盾、复杂却又体现自由本性的一种写作风格。”这既是作家在文学层面对军事题材小说做出的注释，也是对文学终极意义所作出的回应，承担起了一个作家的责任，思考人的最原始的存在状态。

参考文献

- [1]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5-58、61页.
- [2]徐怀中.牵风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以下所引原文均出于此版本,不再一一列举
- [3]李德慧.论徐怀中《牵风记》的叙事艺术[J].吕梁学院学报,2020(05).
- [4]刘大先.返归本心——徐怀中《牵风记》的意象叙事与哲思境界[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11).

作者简介:

杜文静(1995.02—),女,汉族,甘肃泾川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